

明清徽商与区域社会研究

王振忠 著

从徽州到江南

江南文化研究丛书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明清徽商与区域社会研究

王振忠 著

从徽州到江南

江南文化研究丛书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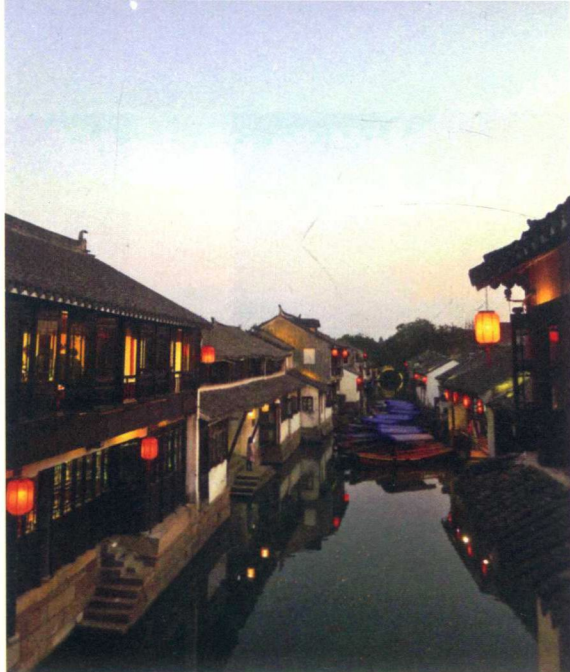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从徽州到江南:明清徽商与区域社会研究/王振忠
著.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8
(江南文化研究丛书)
ISBN 978-7-208-15644-9
I. ①从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徽商-区域社会学-文
化研究-中国-明清时代 IV. ①F729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90711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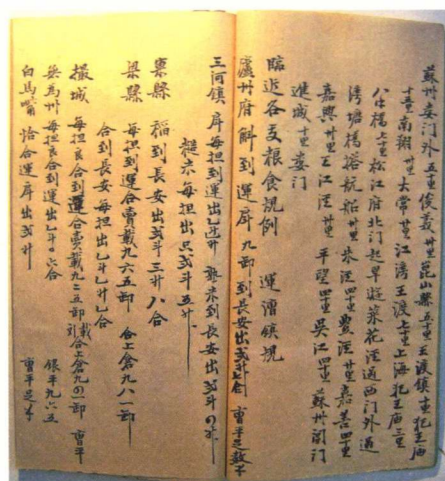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 马瑞瑞
封面设计 郦书径

江南文化研究丛书
从徽州到江南:明清徽商与区域社会研究
王振忠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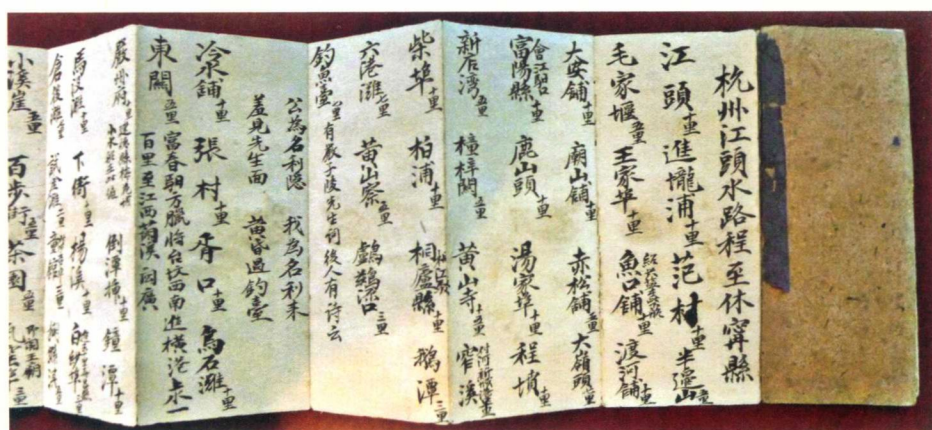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)
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
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720×1000 1/16
印张 18.5
插页 6
字数 305,000
版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印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15644-9/G·1951
定价 78.00 元



江南水乡



徽州商业书中的江南《商贾便览》抄本



商编路程手折



从徽州到江南的船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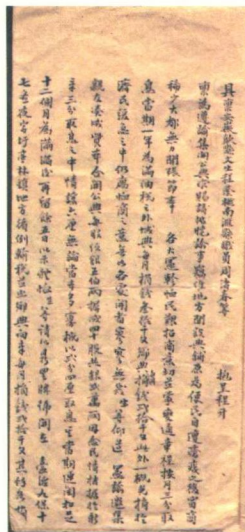
从徽州寄往上海的书信



《典業須知》等四种秘籍（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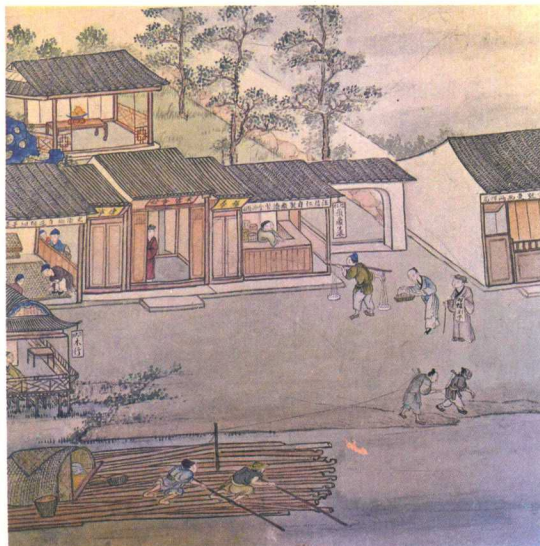


典当业文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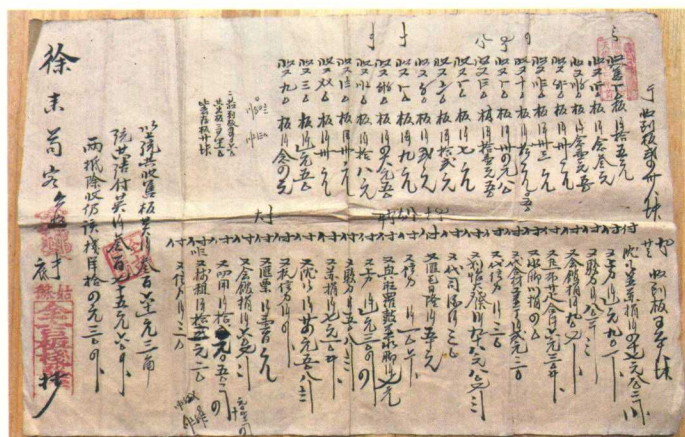


清同治年间南汇典商的

诉讼案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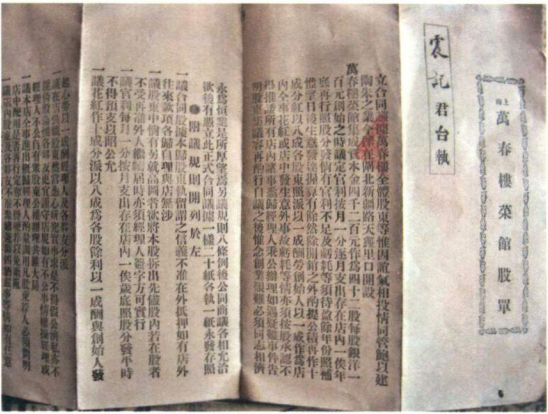
苏州的木客会馆与徽州茶漆店
(法国国家图书馆藏
《苏州市景商业风俗图册》)



苏州木商文书



清乾隆年间徽州
汪启淑的盐业合同



民国时期上海的徽菜馆股单

立合同相商會
商開會議以稱茶各稱車裝運日期退還則現由茶業公會
與相商內向戴生昌內公司訂立茶業稱茶條付土項供此公認
簽字執守
一稱茶揭平稱運額定六萬箱如額數不足由茶業會照額數
補繳水脚又得同空額有所減議
一稱茶自快宸橋裝船運中各稱水脚實收大月由南八外所有
裝卸進棧堆力一概在內此裝故議出定額六萬箱外每
箱水脚由南八外再打九扣以五折外均勞
一稱茶則由進棧堆第十六日起算棧租每箱按月棧租計元全
不與茶主貨由由亦係主棧繳
一稱茶則按隨隨隨茶及得存積性貨車箱在流平均裝運
不得賺多賺少收和復因付又宣

徽商在江南的茶葉貿易



上海《徽甯思恭堂征信錄》

前言

(一)

地处皖南低山丘陵地区的徽州，明清时代是个府级的行政单位，其下辖有歙县、绩溪、黟县、休宁、祁门和婺源六县。在传统时代，因地少人稠，有限的土地上收获的粮食难以自给，故而许多人不得不外出务工经商。诚如徽州俗谚所说：“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，十二三岁，往外一丢。”当地人自嘲——前世作孽，才生在徽州这样自然条件相当不利的环境中。人们到了十二三岁（或者说十三四岁），其中的不少人接受过基础教育，此后，除了在家务农或继续读书深造者外，绝大多数的人就被父母送到外地去做学徒，学习经商，所以说是“往外一丢”。

正是因为大批的徽州人外出务工经商，所以明清方志明确记载：“徽州人以商贾为业。”太平天国前后著名学者汪士铎，甚至直接称徽州的土产为“买卖人”。在明清时期，徽州一府六县所出的商人虽然统称为“徽商”，但各县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，歙县主要以盐商最为著名，休宁人擅长于从事典当业，而婺源主要是木商、墨商和茶商，绩溪人则多是小商小贩，以从事徽馆业为数众多。所谓徽馆业，也就是徽菜馆和徽面馆。

以盐商为例，胡适先生在他的《口述自传》中就曾指出：

徽州人的生意是全国性的，并不限于邻近各省。近几百年来的食盐贸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垄断了。食盐是每一个人不可缺少的日食必需品，贸易量是很大的。徽州商人既然垄断了食盐的贸易，所以徽州盐商一直是不讨人欢喜的，甚至是一般人憎恶的对象^[1]。

在明清时代，徽州盐商以两淮盐商最为著名，他们将苏北的淮盐运往长江中、下游各地，其行销范围包括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和江苏等地。其时，两淮盐业的中心是在扬州，所以两淮盐商中最为有名的商人亦即扬州盐商。明代万历和清代乾隆年间，两淮盐业处于极盛阶段，许多盐商皆囊丰篋盈。根据文献记载，明代万历年间，扬州盐商的资本超过3000万两。及至清乾隆时代，淮南盐务如日中天，一百数十家的徽商西贾麋聚广陵，“蓄资以七、八千万计”。清代前期，康熙、乾隆皇帝先后分别六次南巡，前往江浙各地巡视、游观，其接驾开支多出自淮、浙盐商。扬州盐商之夸奢斗富，连乾隆皇帝都曾惊叹：“盐商之财力伟哉！”

在传统时代，盐商与酱商往往是二位一体，这是因为制作酱料的最主要成分之一就是盐。其时，在江南的核心地带苏州，当地最负盛名的酱商就来自徽州歙县大阜村的潘氏。在歙县南乡，民间素有“周漆吴茶潘酱园”的说法，意思是歙南周邦头的周氏，主要从事漆业经营。在明清时代，“徽严生漆”闻名遐迩，徽商在江南各地开了很多茶漆铺（亦即兼售生漆的茶叶店），其间所售生漆也就是“徽严生漆”。除了周氏经营漆业之外，歙县南乡的吴氏主要经营茶业，而大阜潘氏，则在江南各地从事盐业和酱业经营。潘氏家族对于中国社会（尤其是江南社会）有着重要的影响。在政治上，苏州潘氏出过潘世恩这样的中央级官僚，其一生为官数十年，历事多位皇帝，被称为“四朝元老”。而在文化上，迁居苏州的大阜潘氏中，出现了不少收藏家和学问大师。一直到现在，上海博物馆、图书馆珍藏的文物、典籍中，就有不少来自苏州的潘家^[2]。歙县大阜潘氏迁居苏州之后，因经营盐、酱等业发财致富，并逐渐将商业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，遂成为江南一带著名的文化世家。

[1] 唐德刚译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第一章《故乡和家庭》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2页。

[2] 参见苏州博特馆编：《攀古奕世：清代苏州潘氏的收藏》，凤凰出版社2018年12月版。

在江南，富裕程度仅次于盐商的还有徽州之典当商。在明清时代，江南一带素有“无徽不成典”的说法，意思是说典当业大多是徽州人所开，即使是晚清民国时期徽州典当衰落以后，一些并非徽人开设的典当中，徽州出身的典当铺职员也占相当多数。在徽州，休宁的典当商尤其著名。在江南社会，一方面，“济一朝燃眉之急，供万家不时之需”，遍布城乡各地的典当铺便民缓急，为下层民众须臾不可或缺，这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。但在另一方面，“荒年熟典当”，典当业总是乘人之危而暴发不义之财，似乎成了城市、乡村社会贫困化的罪魁祸首，这一点，被世人不断地强化，从而造成民众强烈的负面观感。

除了盐商和典商之外，徽州木商也相当著名，民间俗有“盐商木客，财大气粗”的说法，“木客”也就是木商。徽州地处万山之中，森林茂密，盛产杉木。自南宋定都杭州以来，徽州的木材就顺着新安江源源东下，这些木材除了供官府建设宫殿、造船之用外，于一般民众的需求而言，还可用以打造棺材。在明清时代，江南一带素有“生在扬州，玩在杭州（或苏州），死在徽州”之谚。这句话的意思是——扬州是不少徽州盐商聚居的地方，故而很多徽人后裔就生在扬州；“上有天堂、下有苏杭”，苏州的市廛盛况和杭州之西湖美景令人流连忘返，故曰“玩在杭州（或苏州）”。至于所谓的“死在徽州”，则有两个方面的涵义：一是徽州是中国风水学的中心，徽州罗盘（史称“徽盘”）蜚声远近；二是徽州的棺材板极负盛名。关于这一点，早在明清世情小说中，就常见有“婺源加料双辘”寿板的记载。直到晚清时期，在《申报》等近代报刊上，也仍然时常刊载出售婺源寿板的广告。

盐、典、木号称“闭关时代三大商”，是当时实力最为雄厚的商人。除此之外，比较有特色的还有绩溪之徽馆业。徽州人的饮食有着比较独特的口味，其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嗜油（虽然说嗜油是中餐饮食中较为普遍的特点，但徽菜在这方面似乎表现得更为突出，尤其是对猪油的特殊嗜好）。从总体上看，徽菜虽然油腻，但在明清时期，随着徽州移民的大批外出以及徽商财力之如日中天，徽菜馆和徽面馆盛行一时。及至民国时期，王定九所编的《上海门径·吃的门径》中还形容申城是“徽气笼罩的上海街市”，他分析说：“徽人在上海的典质业中服役的最多，富有势力，上海的典当押肆，无论那〔哪〕条街上，终有一二所，徽馆为适合同乡人的口味，所以和典当押肆成正比例，也是每一条街上必有一二所。”

在徽州，民间有“一等生业，半个天下”的俗谚，这是指徽州人以经商为第一等生业，活动的地域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。而在这些地区，歙县的盐商，休宁的典当商，婺源の木商、墨商，绩溪的徽馆商人，等等，全都以其鲜明的特色闻名遐迩。

(二)

在明清时代，江南是徽商重点经营的区域。因此，当地民众对于徽商的刻画也特别丰富而生动。较早提及徽商活动的《云间杂识》，就出自江南的核心地带松江府，其中提及：“松民之财，多被徽商搬去。”在一些人的心目中，江南百姓的财富都被徽商盘剥去了。在当时，社会上始终弥漫着一种仇富的情绪，许多人只看到富人席丰履厚，过着夸奢斗富、纸醉金迷的生活，遂在心理上产生了严重的失衡。

譬如，佚名《云间杂志》卷下记载：明代松江华亭人钱福（号鹤滩），垂涎于江都某妓，及至扬州，该妓已嫁与盐商，“乃往谒商，……祈一见妓耳。商许之，出妓把酒。酒酣，妓出白绫帨，请留新句，公遂书一绝：‘淡罗衫子淡罗裙，淡扫蛾眉淡点唇，可惜一身都是淡，如何嫁了卖盐人。’”此一故事，在另一部晚清的笑话集——独逸窝退士所辑之《笑笑录》中，亦有类似的记载：

杭州妓者，多鬻身鹺客，一妓号素娥，为歙商所据，吾乡黄南谷过之，见壁上小像，书曰：“淡红衫子淡红裙，淡淡梳妆淡点唇，可惜一身都是淡，将来付与卖盐人。”

“独逸窝退士”不知姓甚名谁，但他系苏州人则是可以肯定的。在他的笔下，故事地点从扬州改到了杭州，但主角之一仍然还是“鹺客”（亦即盐商）。其实，两个故事出自同一母本，其主人公究竟是钱福还是黄山谷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其中反映了江南文人学士对于徽商根深蒂固的反感和偏见。此种仇富心态相当普遍，在当时的不少文学作品、曲艺节目中，“徽州朝奉”通常皆以反面形象出场。在三言二拍等明清世情小说中，徽州朝奉总是与为富不仁、吝啬好色联系在

一起。清人沈起凤在《谐铎·鄙夫训世》中，就以极端的方式，刻画了徽商的社会形象。文中的那位徽商，在江南的核心地带——苏州以小本起家，后来通过卖布发了大财。他大言不惭地说：要想致富，必须先治“外贼”，后治“内贼”。所谓外贼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。具体言之，不要贪图美色，找个丑女人做老婆，一样可以生儿育女；耳朵不要听靡靡之音，在野地里听听秧歌就可以了；鼻子也不要闻香气，闻闻马粪的气味也不错；山珍海味无非是舌尖上的享受，我整天喝稀粥吃咸菜，也能吃得饱；至于穿衣打扮，穿得再好，完全是便宜了他人，他们看在眼里舒适，而我却花了血本。其实，只要用树叶做衣裳，将草戴在头上，从头到脚不花一分钱，最好。至于“内贼”，也就是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有人做慈善事业，我从来不做这样的傻事，免得挥霍了自家钱财；我见利就上，可以一生享用；常言虽说要礼尚往来，但我却来而不往，这样就可以占人便宜；聪明人往往会遭人所忌，我整天浑浑噩噩，可以长久保持平凡的幸福；至于诚信更是无益于事，我不妨嘴上慷慨些，但心里却不以为然，让天下人都知道我失信，所以就不会上门找我借钱。这五方面，是去除内贼的“诀窍”。总之，做人要精明，不要脸，不好名，不顾廉耻，笑骂由人，长此以往，要想致富，真是易如反掌……

这当然是讽刺徽商的段子，类似于此的噱头，在江南的评弹、滩簧中亦时常见，折射出江南各地民间普遍的仇富心态。

其实，不少人没有看到这些富人中，有许多人在创业的年代是相当艰苦的。不少人勤俭起家，小本起家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有人在纪念胡适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：从前徽商走遍全国，往往背着一个口袋，里面装着炒米（或炒面粉），每到一地方，只要问老板要点水喝，就可聊以充饥。因为水是要钱的，有水和炒米一吃，便省下了伙食费的大笔开支——这应是昔日不少徽州人外出的惯例。从中可见，徽商之吃苦耐劳、精打细算显然是有目共睹的。但到了富二代、富三代，生在高墙大院、长于妇人之手的小朝奉，“不思祖业多艰苦，混洒银钱几时休”。

如何改变徽商的这种社会形象，从明代中叶起就引起了徽州人的重视。他们通过提高个人素质，在各地从事慈善事业，改变了世人心目中的固有形象，从而塑造出徽商的整体形象。此种整体形象，亦即“贾而好儒”、“富而好礼”。

(三)

徽州地处皖南的低山丘陵地带，从地理环境来看是相当闭塞的。但由于徽商呼朋引类地持续外出，又不断地将经商所得利润汇回桑梓故里，将各地的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不断地引入徽州。再加上长期以来徽人重视文化积累，所以徽州文化遂呈现出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同生共荣的奇特景观。特别是经过徽商持续不断的努力，他们对于明清以来的江南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对于江南而言，徽商在很多地方都是外来者，他们在城镇乡村聚居，逐渐开枝散叶，生根发芽，由侨寓商人逐渐成为当地的土著，从而完成了由祖籍地缘向新的社会圈的转移。由于徽州移民人数众多，迁移过程又持续不断，再加上财力雄厚，且人群素质相对较高，故而对于江南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大致说来，最主要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一是为江南社会输送了大批的人力资源，并在江南独特的人文环境滋养中，涌现出诸多杰出的人才。许多徽州人走出万山之中，开阔了眼界，不仅促成了各个侨寓地社会文风的嬗变，而且，对于徽州本土的变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。胡适先生曾说过：

……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，历尽艰苦，冒险经商的传统，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。由于长住大城市，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，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。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，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的学校要好得多，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说，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。因此在中古以后，有些徽州学者——如十二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，尤其是十八、九世纪的学者如江永、戴震、俞正燮、凌廷堪等等——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，都不是偶然的。〔1〕

胡适本人就出自绩溪的茶商世家。他家自祖上就在上海浦东川沙开了几家茶

〔1〕 唐德刚译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第一章《故乡和家庭》，第3—4页。

叶铺，最早的一家叫“胡万和”茶叶店，位于川沙镇的大街正中，颇为气派，因为当时川沙尚未建县，故而当地有“先有胡万和，后有川沙县”的民谚。由于家族中的不少人都在上海经商，所以胡适也就到上海接受教育，后前往美国留学，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成就卓著的一位学者、文化名人。

除了在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这些顶尖人物之外，徽州在科举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据旅美学学者何炳棣先生的统计，从1647年到1826年，徽州府产生了519名进士（包括在本地考中进士和寄籍他乡及第的），在全国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至六名。在此同时的180年间，江苏省产生了一甲进士（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）94名，其中有14名出自徽州府；浙江一甲进士59名，有5名是徽州人。^[1]

历史上徽州涌现出诸多著名人物，从明清进士一直到现当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方面的人才都相当之多。胡适先生甚至说，“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，四出经商，足迹遍于全国。最初都以小本经营起家，而逐渐发财致富，以至于在全国各地落户定居。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，你总可以发现许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。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，几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。其他如叶、潘、胡、俞、余、姚诸姓，也大半是源出徽州。当你翻阅中国电话簿，一看人名，你就可知道他们的籍贯。正如在美国一样，人们一看电话簿，便知道谁是苏格兰人，谁是爱尔兰人，谁是瑞典人、挪威人等一样的清楚。”^[2] 这些，都说明徽州移民对于外部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。

除了为江南输送了大批人力资源之外，徽商对于江南社会的第二个影响是：带来了财富与商业规范。在明代，一些徽商巨贾的资本规模是数百万两白银，及至清代前期，那些大徽商的资本多达数千万两白银。由于财力雄厚，这使得徽州的借贷资本比较充裕，一般人都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民间借贷的融资，获致出外务工经商的本钱。正是因为这一点，使得小本起家的人数大大增多。

除了借贷之外，以个人信用为担保的“做会”，也是获得低息贷款的有效途径，这对于徽商之崛起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。明清以来，江南各地流行的一种会，就叫“徽会”，亦即以徽州约定俗成的规范“做会”。对此，费孝通先生在《江村经济——中国农民的生活》一书中指出：

[1] [美] 何炳棣著：《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》，王振忠译，陈绛校，《历史地理》第11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。

[2] 唐德刚译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第一章《故乡和家庭》，第3页。

不久以前，有人提出一个比较简单的互助会办法，叫徽会，因为据说这是从安徽传来的。这个会的收款次序，及每个会员交纳的款数，均事先约定。^[1]

费孝通的名著《江村经济》一书作于1935年，其中提到不久之前传入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的“徽会”。另外，2005年，安徽学者徐越、方光禄曾介绍过一种会书，是民国二十年（1931年）方吉庆所定，在会叙中有“至于收发，悉照新安古式，而今湖地皆遵”之语。^[2]“新安”也就是徽州的旧称，这显然反映出——湖州一带邀会的做法，也是源自徽州。上述二例皆表明，徽州人做会的规范，受到了江南各地人的遵循。在传统时代，做会是民间融资的一种重要方式，它使得徽州乃至江南社会充满了商业活力，因此绝不能小觑此类的“徽会”。

除了“徽会”之外，徽商的不少经营规范，也逐渐成了江南一带共通的商业规范。例如，在明清时期，松江府所产的棉布号称“衣被天下”，此处生产的棉布销往大江南北、全国各地，甚至还远销到世界其他一些地方。当年，在国际上非常著名的“南京布”就主要出自包括松江府在内的江南地区。而从事此类棉布贸易最为重要的商帮之一，就是徽商。关于这一点，除了方志、笔记、文集资料的记载之外，还有现存的写本文献可以佐证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所看到的《布经》抄本计有五种，这些商业书，对于制布业之原料产地、棉布市镇的分布、销售区域，以及徽商和山西商人对于商业书创作的贡献与交流等，都有着具体而微的描述。其中的四种，都是以棉布业的中心松江府为重点区域展开记录，只有一种范围更广，涉及江南和浙西的金华府兰溪一带，这当然也在广义的“江南”范围之内。至于其编者，除了一种是山西商人所编之外，其他的四种皆出自徽商之手。这些，都从诸多侧面反映了徽商与江南社会的密切关系。从文本的内容来看，徽商在布业经营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，他们在长期商业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与规范，也逐渐为同行业的其他商人所吸收、总结与遵循。再如，明清以

[1] 费孝通：《江村经济——中国农民的生活》，见《费孝通全集》第2卷（1937—1941）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258—259页。

[2] 徐越、方光禄：《清末和民国徽州民间的经济互助——以徽州会书为中心》，《黄山学院学报》2005年第2期。

来，江南各地素有“无徽不成典”的说法。根据前人的研究，在长江中下游一带，典当业的人事组织有徽帮式、宁波帮式和绍兴帮式等几种代表性的典当业组织。其中，“以徽式典当的组织最为严密，责任明晰，合于管理精神”。^[1]典无废人，经营管理的制度化，是徽州典当经营文化的一个特点。所以，源自徽州的“朝奉”一词，后来竟成了典当业中职员의统一称呼。类似于此的情况，在木材、制墨等行当中亦所见颇多。这些，在在皆可反映出——徽州人制定的商业规范，在江南各地极为盛行。

徽商对于江南社会的重要影响，还表现在他们与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一带城镇化进程的关系上。当时，长江中下游地区广泛流传的“钻天洞庭（或龙游）遍地徽州”“无徽不成镇”等俗谚，就极为生动地反映了这一重要影响。所谓无徽不成镇，是指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市镇中，徽商的活动相当活跃。根据胡适的诠释，在长江中下游一带，一个村落如果没有徽州人，那这个村落就只是个村落，徽州人进去了，就会开设店铺，开展贸易经营，逐渐发展商业，从而将一个村落转变成市镇。胡适为绩溪人，出自徽商世家，他对“无徽不成镇”的解释容或略有夸张，但其中心意思是说，徽商在江南许多地方的城镇化过程中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的确，在明清时代，长江中下游各地的城镇中，徽商是随处可见。17世纪初编纂的万历《歙志》中，有一篇内容颇为丰富的《货殖》，其中就提及：

今之所谓都会者，则大之而为两京、江、浙、闽、广诸省，次之而苏、松、淮、扬诸府，临清、济宁诸州，仪真、芜湖诸县，瓜洲、景德诸镇，……故邑之贾，岂惟如上所称大都会皆有之，即山陬海壖、孤村僻壤，亦不无吾邑之人，但云大贾则必据都会耳。

在明代，歙县是徽州一府六县中经商风气最为炽盛的二县之一（另一为休宁县）。上述这段话，基本上可以代表徽商眼中的全国各大城镇。其中所提及的“苏、松”，也正是江南的核心地带。而从诸多历史典籍来看，在当时，无论是繁华都会还是僻野乡村，处处都可看到徽州人的足迹。特别是在江南的城镇化过程

[1] 潘敏德：《中国近代典当业之研究（1644—1937）》，“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”，1985年，第142页。

中，徽商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。1933年，胡适在北平寓所写信给族叔胡近仁，讨论《绩溪县志》编纂的体裁，其中谈道：

县志应注重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。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，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“大绩溪”。若无那“大绩溪”，小绩溪早就饿死，早已不成个局面。新志应列“大绩溪”一门，由各都画出路线，可看各都移殖的方向及其经营之种类。^[1]

在这里，出自徽商世家的胡适提出了“小绩溪”和“大绩溪”的概念，提醒人们应注意历史时期徽州商业网络的编织。后来，当代的徽学研究者在他的启发下，引申出“小徽州”和“大徽州”的概念，将徽州社会经济史置诸长江中下游乃至整个中国的背景中去考察。所谓小徽州，是指徽州本土的一府六县，而大徽州则是指徽商活跃的区域，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。“无徽不成镇”的江南，是徽商重点经营的区域，自然也是“大徽州”的核心地带。明清时代“遍地”可见的徽商占据了商业上重要的位置，可以说是执商界之牛耳。徽商的活动，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江南市镇之发展。

徽商对江南的重要影响，还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。徽商在江南各地的频繁活动，曾引起明清时代社会风尚的重要变化。徽商的大批外出，导致了“徽礼”（徽州礼俗）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盛行。徽州的祭祀礼俗，恪遵朱熹的“文公家礼”，由此形成的“徽礼”，在徽州乃至徽商所到的整个南中国地区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。侨寓各地的徽州移民，通过家祭、祠祭、墓祭、会馆祭等，使得徽州的礼俗为世人所熟知——这就是长江中下游各地颇为流行的“徽礼”。精密详备的徽礼，使得侨寓异地的徽州人大大区别于其他各地的人群。

另外，明代中叶以来，徽商在江南各地大规模地收集古玩、文物，曾引起整个社会鉴赏时尚的变迁。当时，财聚力厚的徽商凭藉着巨额资产，大量购置金石、古玩和字画。最初，那只是对士大夫生活方式的一种盲目模仿。他们认为：“雅俗之分，在于古玩之有无。”^[2]因此，不惜重价，动辄成百上千件地收购。这

[1] 《致胡近仁》，见胡适著：《胡适家书》，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235页。

[2] [清]吴其贞：《书画记》卷2“黄山谷《行草残缺诗》一卷”条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62页。